



香港亞太研究所

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 1996

王家英 沈國祥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was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1990 to promote multi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reciprocal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irector : Yeung Yue-man, PhD(*Chic.*), Professor of Geography
Associate Director : Lau Siu-kai, PhD(*Minn.*), Professor of Sociology

HK\$30.00
ISBN 962-441-057-7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 1996

王家英
沈國祥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作者簡介

王家英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統籌員。

沈國祥先生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

© 王家英 沈國祥 1997

ISBN 962-441-057-7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目 錄

摘要	1
前言	2
調查目的	3
研究範圍	3
研究方法及設計	4
1. 調查形式	4
2. 調查對象	4
3. 抽樣	4
4. 資料搜集	5
5. 資料處理及分析	6
被訪者的個人背景特徵	6
當前的公民意識狀況	9
1. 公民權利與義務的認知	9
2. 公民態度	12
3. 公民參與	17

被訪者對九七回歸的態度	22
1. 對九七年後香港狀況的評估	23
2. 面對九七最擔心的問題	24
3. 對移民的考慮	26
作為未來特區公民可能面對的困難	29
1. 身份認同及香港本位意識	30
2. 自由人權與國家民族的潛在矛盾	33
3. 與中國整合的問題	36
結論	39
參考文獻	41
英文摘要	43

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 1996

摘 要

本報告陳述了第二次後過渡期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的年度電話調查結果。此調查經沙田區議會委託，調查工作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進行。基於比較的原因，我們隨機訪問了全港 1,303 位年齡十五至二十四歲的青少年，另附訪沙田區同年齡層 271 人，結果發現：（一）香港青少年的公民意識狀況既有穩定的一面，也有變化的一面。在公民權責的認知方面，一九九六年香港青少年尤其肯定個人的自由人權等權利，責任方面則著重個人守法及盡本份的層面。在公民態度方面，香港青少年仍然傾向消極負面及犬儒主義，而較一九九五年尤有過之。然而，香港青少年對投票是向政府表達意見的最有效方法仍與一九九五年一樣，抱有積極的態度，對九七回歸的態度亦較一九九五年正面。至於香港青少年的公民參與方面，與一九九五年的調查相若，一方面青少年對新聞時事表現出頗高的關注，但在社會參與及政治參與上便顯得有點裹足不前。（二）香港青少年對九七後的香港狀況的評估較一九九五年稍為樂觀，但整體上仍然稍顯灰暗；而且仍然有四成多表示若能力許可的話，他們會／可能會／已經辦妥移民。（三）由於九七回歸觸動到香港公民意識的民族層面，一九九六年的調查特別加闢了公民意識中有關民族意識的探討。我們發現，香港青少年的香港本土認同十分強烈，同時認為維護自由人權較維護國家民族利益來得重要。儘管如此，香港青少年大多數對中國歷史文化和在香港推動民族教育仍相當肯定，也願意促進中國大陸發展。（四）一九九六年沙田區的青少年與香港青少年的公民意識狀況、九七態度和民族意識等，儘管在個別指標上有細微的分別，但並沒有任何重大的差異。

前言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將從一個依賴性的英國殖民地，轉變為一個在中國主權下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特別行政區，並按《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規定，享有「高度自治」。由主權轉移而引起的種種對社會政治意識的衝擊，早已為學者及社會人士的關注（劉兆佳，1993；Lau and Kuan, 1988；Kuan and Lau, 1989）。在這轉變的過程中，作為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主人翁的青少年，他們的公民意識狀況又如何呢？面對回歸中國所帶來的潛在矛盾，又如何自處？

有見及此，沙田區議會公民意識推廣及青少年事務工作小組於一九九五年開始，委託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就香港青少年的公民意識狀況進行了首次調查，探討香港青少年的公民意識及其九七態度，重點放在「當前」的狀況。一九九六年本研究所繼續接受沙田區議會公民意識推廣及青少年事務工作小組委託，進行第二次的有關調查，除了嘗試捕捉期間一年的變化外，亦試圖探究青少年作為未來特區公民時所要面對的潛在問題，重點放在「前瞻」的視野上。

記得在一九九五年調查撮要報告的總結上，我們曾經指出，「無論如何，上述香港青少年的九七態度和公民意識並非一成不變，而是與香港整體社會政治環境存有複雜密切的關係。隨著九七主權移交的迫近以至完成，和新的社會政治形勢的形成和開展，香港青少年的九七態度、後九七態度，以及公民意識狀況，相信會相應地出現變化，而這些變化應是未來有關研究的努力方向」（王家英、沈

國祥，1996：46）。我們深深體會到香港後過渡期最後階段下公民意識變化的複雜性，希望通過持續的社會調查，對有關問題作出更深入的理解。

調查目的

是次調查的目的在於：

- （一）在一九九五年的有關後過渡期下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調查的基礎上，進一步加深我們瞭解當前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的發展與變化；
- （二）探討香港青少年面對回歸中國的態度及其所憂慮的問題；
- （三）澄清香港青少年的本土認同與中國認同之間的關係及其作為未來特區公民可能遭遇的困難。

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探討兩大面向。其一是當前後過渡期最後階段下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的狀況，範圍包括探討他們的公民意識在認知、態度和參與三個層面上的狀況和相互的關係，以及他們對九七回歸的態度。通過與一九九五年調查作比較，務求使我們能更深入得知當前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的狀況與變化，面向的重點在於「當前」。其二是香港青少年作為未來特區公民可能面對的困難，範圍包括探討他們的本土意識、身份認同、對中國的態度，及自由主義心態與國家民族理念的衝突等問題，面向的重點在於「未來」。

研究方法及設計

1. 調查形式

是項調查以預設問卷通過電話訪問形式進行。問卷中的問題主要採用封閉式（即有預設性答案），但為了兼顧一些主觀性較強的問題，問卷中亦輔以開放式問題。在問題設計的過程中，我們與委託單位沙田區議會公民意識推廣及青少年事務工作小組進行了充份的討論，再經多次的「先導測試」（pilot test），並根據測試的結果反覆修正定卷。

2. 調查對象

我們的調查對象是香港青少年。這裏所謂青少年，是指在電話訪問當天已年滿十五歲（過了十五歲生日）而又不超過二十四歲（未過二十五歲生日）的所有香港居民。將青少年定義於十五歲至二十四歲之間，一方面是參考了過去有關調查的做法，再配合我們研究需要而作出的決定，另一方面是因應過往同類型的調查，以作比較。

3. 抽樣

是項調查的樣本分為兩個，其一為全港性樣本，其二為沙田區擴大樣本。全港性樣本的抽樣方法如下：先從最新的香港住宅電話簿（英文版）中隨機抽出若干電話號碼；為了使未刊載之住宅電話號碼也有機會被選中，我們將已抽選的電話號碼最後的兩個數字刪去，再配上由電腦產生的隨機數字，成為是次調查的全港性樣本。至於沙田區擴大樣本，則先從全港性樣本中已知沙田區電話號碼的

前四個號碼為前置號碼，四個後置號碼則由電腦產生的隨機數字組成。當成功接通所有樣本電話號碼並確定了住戶中有年齡介乎十五歲至二十四歲的青少年後，以出生日期選出其中一名為訪問對象。

4. 資料搜集

調查訪問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三日至十一月十五日，每天晚上六時至十時，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電話調查研究計劃的學生訪問員，利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 CATI 進行電話訪問。在訪問正式進行之前，訪問員均曾接受詳細的答問訓練，以先熟習訪問期間所可能遭遇的各種問題。

在全港性樣本中，我們抽選和配置了總數 13,744 個電話號碼，成功確定住戶電話數目 6,191 個，當中無適當被訪者 4,001 個，拒絕接受訪問有 887 個，成功訪問樣本有 1,303 個，成功接觸住戶後的成功回應率為 59.5%（ $1,303 \div (1,303 + 887)$ ）。另一方面，沙田區擴大樣本抽選和配置了總數 1,586 個電話號碼，成功確定住戶電話數目 742 個，當中無適當被訪者 311 個，拒絕接受訪問 160 個，成功訪問樣本 271 個，成功率為 62.9%（ $271 \div (271 + 160)$ ）。

在全港性 1,303 個成功樣本數中，有 156 個居住沙田區，再加上沙田區成功的擴大樣本數 271 個，我們得出 427 人的沙田區總樣本，以作為與全港性樣本比較之用。不過，要注意的是，由於 427 人並不是一個很大的樣本數，抽樣誤差較大，加上與全港性樣本有重複，因此報告中的比較只具一般的參考價值。

5. 資料處理及分析

所有訪問所得資料經小心校正和編碼後輸進電腦，再由 SPSS for Windows 6.1 統計軟件分析處理。分析分為兩個部份，一是人數及百分比的描述；二是利用交互表（crosstabulation）及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探求變項之間的關係及其強弱，並經兩端顯著度測試（two-tailed significance test）以鑑定顯著關係並非因隨機抽樣誤差所致。在分析時，我們會一併比較全港性樣本與沙田區總樣本在有關問題上的異同。

被訪者的個人背景特徵

表一列出了是次調查被訪者的個人背景特徵，共分六個方面：性別、年齡、出生地、居港年期、教育程度及在學／就業。

首先是性別方面，在全港性樣本 1,303 位被訪者中，男性有 684 人，女性有 619 人，分別佔總樣本人數的 52.5% 和 47.5%；而據香港政府統計處剛公佈的《一九九六年中期人口統計：簡要報告》所載，全港十五至二十四歲人口中，男性佔 50.7%，女性佔 49.3%。換言之，是次調查的男性被訪者較全港的百份比稍多，而女性被訪者則較全港的百份比稍少，相差約 1.8%。造成差誤的原因，除了可能由於抽樣誤差外，也可能涉及年齡組別、地區及教育等因素，但由於中期人口報告所載資料有限，難以作出具體比較，故兩者的差異尚不清楚。至於在沙田區，總樣本 427 位被訪者中，男性有 219 人，女性有 208 人，分別佔樣本人數的 51.3% 和 48.7%。由於中期人口報告中沒有

分區的資料，我們並不知曉有關樣本與沙田區具體情況是否存有差異。

年齡方面，全港性樣本與沙田區總樣本一樣，十五至十九歲的被訪者較二十至二十四歲的被訪者為多，雖然在一九九六年中期人口普查的簡要報告中，並沒有按年歲細分的數據，以一九九一年人口普查結果來估計，二十至二十四歲的年齡組理應較十五至十九歲為多，即是次的調查中，十五至十九歲的人士較具體情況為多。當中的可能原因，除了一般的抽樣誤差外，恐怕與年齡較大的青少年較少留在家中，不易為我們成功接觸訪問有關，這種情況在其他有關青少年的研究抽樣中，亦常常遇到。

出生地方面，不論來自全港性還是沙田區總樣本的被訪者，絕大多數均在香港出生，在全港性樣本中，有 83.9% 的被訪者是在香港出生的，在沙田區總樣本中，香港出生的更佔 90.4%，較全港性樣本的被訪者高出 6.5%。此外，在全港性及沙田區兩個樣本中，在香港以外出生的被訪者已在港定居十年以上者分別佔 53.1% 和 51.2%。換言之，在那些非香港出生的被訪者之中，亦有超過一半是居港超過十年以上的。經過十多年的本地文化及教育的影響，相信青少年因出生地的不同而帶來的社化（socialization）作用應該十分有限。

隨着教育的普及，具中學以上程度的人口漸多，加上專上教育在過去數年亦急劇擴展，青少年的教育程度越來越高，是次調查的樣本基本上反映了這個情況。據表一所示，無論是全港性樣本還是沙田區總樣本的被訪者，九成以上均已達初中教育程度，而達高中或以上程度者亦分別佔 84.9% 和 86.0%。

表一：被訪者個人背景特徵分佈

		全港性樣本		沙田區總樣本	
		人數	百份比	人數	百份比
性別	男	684	52.5	219	51.3
	女	619	47.5	208	48.7
	總計	1,303	100.0	427	100.0
年齡	15歲	178	13.7	56	13.1
	16歲	184	14.1	67	15.7
	17歲	139	10.7	59	13.8
	18歲	152	11.7	68	15.9
	19歲	126	9.7	41	9.6
	20歲	111	8.5	34	8.0
	21歲	88	6.8	35	8.2
	22歲	87	6.7	23	5.4
	23歲	119	9.1	23	5.4
	24歲	119	9.1	21	4.9
	總計	1,303	100.1	427	100.0
出生地	香港	1,088	83.9	386	90.4
	香港以外	209	16.1	41	9.6
	總計	1,297	100.0	427	100.0
居港年期	十年或以下	98	46.9	20	48.8
	十年以上	111	53.1	21	51.2
	總計	209	100.0	41	100.0
教育程度	沒有受教育	1	0.1	0	0.0
	小學	5	0.4	3	0.7
	初中	191	14.7	57	13.3
	高中及預科	862	66.4	298	69.8
	大專或以上	240	18.5	69	16.2
	總計	1,299	100.1	427	100.0
在學／就業	在學	804	61.7	292	68.7
	就業	483	37.1	131	30.8
	沒有工作／待業／失業	16	1.2	2	0.5
	總計	1,303	100.0	425	100.0

從表一中亦可看到，全港性樣本的被訪者有 61.7% 為學生，就業的有 37.1%，而沒有工作／待業／失業的只有 1.2%。儘管沙田區總樣本被訪者的情況亦相類似，但在學者還是較全港性樣本被訪者高了七個百份點，而就業者則低了超過六個百份點，相信這若不是抽樣誤差所致，應或多或少與中產階級較傾向追求高教育程度所致，有關解釋在上一年度的報告中已有所述，不贅。

總括而言，我們的調查樣本的背景資料與普查的初步結果差別不大，加上普查的資料不足，故此我們對於是次調查的樣本，並沒有按普查的資料加權（weighting）以作出糾正。

當前的公民意識狀況

我們探討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的方法，基本上按照一九九五年的調查所設定的分析架構，即公民認知、公民態度和公民參與三個層面進行。

1. 公民權利與義務的認知

在一九九六年的調查中，我們並沒有重覆一九九五年調查有關探討青少年對時事具體認知問題，因為對時事的具體認識有強烈的時效性限制，強作比較分析會存有很多困難。然而，與九五年一樣，一九九六年的調查亦有要求被訪者列出他／她們認為最重要的公民權利和責任，不同之處在於是次調查要求被訪者作為未來特區公民的身份去考慮公民權利和責任的問題。我們不試圖以一固定框架去限制被訪者對公民權責的主觀闡釋（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 (這樣較能提供更為豐富及多樣的答案，但無可避免地會加重編碼的困難)，所以發問的方式仍然採取開放式。

表二的調查結果有兩點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回答「不知道／很難說」的被訪者大幅下降，全港性樣本及沙田區總樣本分別下降了 19.5% 及 19.2%，顯示青少年願意思考這個問題的比率大為提高。其次，在列舉出的最重要特區公民權利的項目中，與一九九五年的調查相似，自由／人權、民主權利／投票／選舉權這二項仍然是被大多數青少年認為是最重要的公民權利。然而，與九五年比較，認為享有自由／人權是最重要的公民權利的比率則大為提高。一九九六年的調查顯示，回答自由／人權的佔壓倒性多數，全港性樣本有 59.5%，較一九九五年的 23.2% 多了 36.3%！沙田區總樣本一九九六年則有 61.3%，較一九九五年的 24.2% 更多達 31.7%！這結果或多或少反映了以下的情況：自由／人權已普遍被認為是九七回歸後香港人作為特區公民的重要權利，而青少年在重視此權利的同時，也憂慮到這權利可能受到九七回歸的影響，故此越加強調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排列第二位重要的民主權利／投票／選舉權，較一九九五年分別下跌 14.5% 和 15.6%。出現如此大幅的下降，也許是由於被訪者已預知未來特區民主程度將會是有所限制所致。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九五年的調查正當立法局選舉剛剛結束不久，被訪者也可能受到選舉宣傳影響而增強對有關權利的意識和強調。

表二：被訪者認為作為特區公民最重要的公民權利（%）

最重要的公民權利	全港性樣本		沙田區總樣本	
	1996	1995	1996	1995
自由／人權	59.5	23.2	61.3	24.2
民主權利／投票／選舉權	7.3	21.8	7.5	23.1
享有各種福利的權利	2.2	2.7	1.6	2.3
享有基本法規定的權利	0.2	—	—	—
享有現在擁有的權利	0.4	—	1.2	—
其他	—	1.2	—	2.0
沒有	—	1.2	—	0.9
不知道／很難說	30.5	50.0	28.4	47.6
(總人數)	(1,300)	(1,641)	(426)	(351)

至於最重要的公民責任（參看表三），一九九六年的調查結果發現，全港性樣本與沙田區總樣本十分相似，最多被訪者回答的三項依次為遵守法律（全港：16.0%；沙田區：16.9%）、做好自己本份（全港：10.9%；沙田區：8.2%）和投票／選舉（全港：7.4%；沙田區：7.3%）。與一九九五年比較，一九九五年排首位的投票／選舉，一九九六年則大為減少，全港性樣本與沙田區總樣本分別下降了 12.6% 及 15.5%。回答遵守法律的被訪者則有所增多，全港性樣本與沙田區總樣本分別增加了 4.3% 及 7.2%，成為首位。明顯地，對於作為未來特區的公民，香港青少年在公民責任的認識上更為突顯個人的層面（守法、做好本份），對政治範疇（尤指投票選舉）反而成為次要。

表三：被訪者認為作為特區公民最重要的公民責任（%）

最重要的公民責任	全港性樣本		沙田區總樣本	
	1996	1995	1996	1995
投票／選舉	7.4	20.0	7.3	22.8
遵守法律	16.0	11.7	16.9	9.7
清潔香港／環保	0.9	6.1	0.2	4.8
貢獻／服務社會／關心社區	4.1	5.2	2.3	6.3
交稅	2.0	4.6	2.3	7.4
做好自己本份	10.9	2.4	8.2	2.8
撲滅罪行／維持治安	1.8	1.9	1.2	2.3
關心時事	2.5	1.6	3.1	1.1
認識中國	0.5	—	0.5	—
參與建設中國	0.5	—	0.2	—
維護中國領土	0.2	—	0.2	—
監察政府	0.3	—	0.5	—
維持現狀／平穩過渡	1.2	—	1.2	—
保護自由人權	1.9	—	3.1	—
協助特區政府	0.5	—	0.2	—
維持香港經濟繁榮	0.7	—	1.2	—
推動社會進步	0.2	—	—	—
提出不同意見	0.5	—	0.2	—
其他	0.0	0.7	—	0.3
沒有	0.0	0.8	—	0.3
不知道／很難說	48.0	44.8	51.2	42.2
(總人數)	(1,301)	(1,648)	(426)	(351)

2. 公民態度

對於公民態度，我們的焦點為一般性的政治態度，問題與一九九五年的調查一樣，目的在於捕捉一九九五年至

一九九六年一年間青少年對一般政治心態的變化。

表四列舉出兩次調查的一般性政治態度。我們在一九九五年的調查中已發現，香港青少年的公民態度明顯是傾向於悲觀甚至是有點犬儒主義的（cynical），這些態度主要表現在對政治人物不信任；認為政治十分複雜，不易明白；對當前的政治現實感到無力；和對政府的政策感到沒有影響力。表四顯示，這種負面的心態在一九九六年的調查中有增無減。在全港性樣本的被訪者中，有 39.8%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香港的政治人物參政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較一九九五年增加 1.2%），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有 35.3%（較一九九五年減少 7.9%）；有 84.2% 同意／十分同意「政治是好複雜的，不是這麼容易明白」（較一九九五年增加 12.6%），而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只有 10.6%（較一九九五年減少 5.3%）；有 55.9% 同意／十分同意「香港的未來都已經被中英兩國政府所決定，香港人怎樣爭取也改變不了現實」（較一九九五年增加 6.0%），而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有 37.5%（較一九九五年增加了 0.8%）；有 53.5% 同意／十分同意「在香港，普通市民對政府的政策沒有甚麼影響力」（較一九九五年增加了 6.7%），而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有 39.0%（較一九九五年增加了 4.2%）。可見香港青少年的犬儒主義心態不僅有其穩定的結構，而這樣結構更似乎出現了兩極化的傾向（如最後的兩個指標同意者和不同意者的比率均有增加）。這情況與沙田區總樣本的結果基本一致。

一九九五年的調查也顯示，積極樂觀的態度主要是認為投票是向政府表達意見的最有效方法，一九九六年的情況更為明顯。在全港性樣本中，有 64.1% 同意／十分同意

表四：被訪者的公共事務態度（%）

公共事務態度	全港性樣本		沙田區總樣本	
	1996	1995	1996	1995
態度一：香港的政治人物參政目的主要是爲了自己的利益				
十分不同意	0.7	1.4	0.2	2.6
不同意	34.6	26.0	34.3	26.0
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21.5	31.3	22.1	35.1
同意	36.6	33.6	37.8	30.0
十分同意	3.2	5.0	2.8	4.3
不知道／很難說	3.4	2.7	2.8	2.0
(總人數)	(1,300)	(1,651)	(426)	(350)
態度二：政治是很複雜的，不是那麼容易明白				
十分不同意	0.5	0.4	0.0	1.4
不同意	10.1	15.5	11.2	13.1
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4.4	10.9	4.9	11.9
同意	79.4	60.4	78.2	59.4
十分同意	4.8	11.2	4.4	12.5
不知道／很難說	0.8	1.7	1.2	1.7
(總人數)	(1,301)	(1,655)	(427)	(352)
態度三：香港的未來都已經被中英兩國政府所決定，香港人怎樣爭取都改變不了現實				
十分不同意	0.7	2.2	0.9	3.7
不同意	36.8	34.5	38.9	40.9
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5.2	11.3	6.1	9.4
同意	52.9	42.1	50.6	37.2
十分同意	3.0	7.8	2.6	6.8
不知道／很難說	1.4	2.1	0.9	2.0
(總人數)	(1,302)	(1,656)	(427)	(352)

表四：被訪者的公共事務態度（%）（續）

公共事務態度	全港性樣本		沙田區總樣本	
	1996	1995	1996	1995
態度四：在香港，普通市民對政府的政策沒有甚麼影響力				
十分不同意	0.1	1.2	0.2	1.7
不同意	38.9	33.6	37.2	33.6
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6.1	15.7	5.4	15.7
同意	51.3	42.6	53.2	41.3
十分同意	2.2	4.2	2.1	5.1
不知道／很難說	1.4	2.7	1.9	2.6
(總人數)	(1,301)	(1,655)	(427)	(351)
態度五：投票是向政府表達意見的最有效方法				
十分不同意	1.1	1.6	0.7	3.1
不同意	27.7	34.9	24.6	30.1
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6.5	12.0	7.0	13.6
同意	62.3	45.3	64.4	47.4
十分同意	1.8	4.5	2.3	4.8
不知道／很難說	0.6	1.7	0.9	0.9
(總人數)	(1,301)	(1,652)	(427)	(352)
態度六：在九七主權移交當日，香港應該隆重慶祝				
十分不同意	1.2	4.2	0.7	6.0
不同意	25.6	44.8	26.7	45.3
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6.8	12.6	9.6	13.5
同意	61.8	31.2	59.0	28.7
十分同意	1.9	3.2	1.4	3.4
不知道／很難說	2.7	4.1	2.6	3.1
(總人數)	(1,300)	(1,642)	(427)	(349)

「投票是向政府表達意見的最有效方法」（較一九九五年增加了 14.3%），而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只有 28.8%（較一九九五年減少了 7.7%）。沙田區的情況也大抵如此。換言之，香港的青少年對投票作為一種反映民意的方法明顯是有進一步的肯定；此外，這結果也可以理解為，經過了九四及九五年三級議會選舉一年多後，青少年對由選舉產生的議會的作用產生更強的信心，雖然這種信心似乎對青少年的主觀政治效能感（即自己對政府或公共事務的影響力的一種感覺）絲毫沒有幫助。

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對九七主權回歸日的感覺。在一九九五年全港性樣本中，不同意／十分不同意「在九七主權移交當日，香港應該隆重慶祝」的被訪者（49.0%），較同意／十分同意（34.4%）的為多，反映出青少年對九七回歸日沒有太多積極肯定的感覺。但一九九六年的調查結果卻倒轉過來，全港性樣本中有 63.7% 同意／十分同意「在九七主權移交當日，香港應該隆重慶祝」，而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只有 26.8%。沙田區總樣本的情況基本相若。這種轉變可能是隨著主權移交日近，而香港整體社會、經濟、政治等還算平穩，香港青少年因而越益採取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

調查訪問進行期間剛好是未來特區行政長官選舉，我們亦對被訪者詢問了他們心目中擔任未來特區行政長官人選最重要的條件，相信這對了解香港青少年的公民態度有輔助的作用。表五的結果顯示，被訪者認為最重要的特首條件首位是有良好操守及廉潔（全港樣本：32.8%；沙田樣本：31.7%），其次是敢於提出與中方不同意見（全港樣本：28.8%；沙田樣本：31.0%）、得到香港市民接納

（全港樣本：23.8%；沙田樣本：24.4%）及有行政管理經驗（全港樣本：11.2%；沙田樣本：10.6%）。最少被訪者回答的是得到中方接納（全港樣本：1.5%；沙田樣本：1.4%）。得到市民接納這個現代社會常視為政權認受性的最主要條件，在香港青少年心目中竟不夠良好操守及廉潔來得重要，多少反映出香港青少年的政治文化仍有一定的保守傾向。

表五：被訪者對擔任未來特區行政長官人選最重要條件的看法

未來特區行政長官 人選條件	全港性樣本		沙田區總樣本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有行政管理經驗	145	11.2	45	10.6
得到中方接納	20	1.5	6	1.4
得到香港市民接納	309	23.8	104	24.4
敢於提出與中方不同意見	373	28.8	132	31.0
有良好操守及廉潔	426	32.8	135	31.7
唔知道／好難講	24	1.9	4	0.9
總計	1,297	100.0	245	100.0

3. 公民參與

與一九九五年的調查一樣，一九九六年的調查對香港青少年公民參與的觀察分為三部份，一是對時事的關心，二是對社會義務工作的參與，三是對政治的參與。

在關心時事方面，我們向被訪者詢問了他們讀／聽／看新聞的頻次和實際與人討論時事問題的頻次。表六顯

示，不論是全港性樣本還是沙田區總樣本的被訪者，他們對新聞時事頗為關心，回答經常讀／聽／看新聞的分別有 49.7% 和 50.1%，而回答偶爾的也分別有 48.7% 和 46.8%，表示完全對新聞時事不聞不問的僅有 1.5% 和 3.0%。這種情況與一九九五年相若。整體而言，這是一個頗為不差的數字，足以反映出香港青少年對其身外發生的事物具有一定程度的關注。

至於進一步與別人討論時事問題，表六顯示，在一九九六年的調查中，全港性和沙田區總樣本分別有 65.8% 和 66.0% 的被訪者偶爾與人討論時事問題，完全沒有的有 28.6% 和 26.9%，表示經常的只有 5.5% 和 7.0%。其分佈與一九九五年的調查十分相似，即大多數的香港青少年對時事的討論還是強差人意而已。

在一九九五年的調查中我們已發現，相對於對新聞時事的關注，香港青少年在參加社會義務工作上便顯得相當消極。一九九五年的情況也是一樣，在全港性和沙田區總樣本中，分別有多達 64.3% 和 66.3% 的被訪者表示完全沒有參加社區或社團的義務工作，表示偶爾參與的有 32.1% 和 31.1%，而表示經常參與的只有 3.6% 和 2.6%（參看表六）。顯而易見，香港青少年對社會義務工作參與相當貧乏的情況，在期間一年中並沒有明顯改善的跡象。

關於青少年的公民參與，我們在一九九六年的調查中增加了社會行動參與（即遊行集會的參與）。因為香港社會日趨自由民主開放，社會行動日多，作為一種公民參與，其蘊含的社會意識亦最高（參與成本亦然）。然而，全港性和沙田區總樣本均指出，表示經常參加遊行或靜坐

示威的被訪者佔極少數，分別只有 0.2% 及 0.0%。大部份的被訪者皆表示完全沒有，分別有 85.7% 及 89.5%。以前述香港青少年較為負面及保守的公民態度看，這結果實不足為奇。

表六：被訪者的公民參與情況（%）

公民參與	全港性樣本		沙田區總樣本	
	1996	1995	1996	1995
讀／聽／看新聞的頻次				
完全沒有	1.5	2.2	3.0	1.7
偶爾	48.7	53.7	46.8	49.7
經常	49.7	44.1	50.1	48.6
(總人數)	(1,303)	(1,660)	(427)	(352)
討論時事問題的頻次				
完全沒有	28.6	30.2	26.9	27.8
偶爾	65.8	64.1	66.0	67.0
經常	5.5	5.7	7.0	5.1
(總人數)	(1,303)	(1,660)	(427)	(352)
參加義務工作的頻次				
完全沒有	64.3	61.9	66.3	62.8
偶爾	32.1	33.3	31.1	34.4
經常	3.6	4.8	2.6	2.8
(總人數)	(1,303)	(1,660)	(427)	(352)
參加遊行或靜坐示威的頻次				
完全沒有	85.7	—	89.5	—
偶爾	14.1	—	10.5	—
經常	0.2	—	0.0	—
(總人數)	(1,303)	—	(427)	—

至於投票參與，我們主要查詢被訪者過去在三級議會的投票經驗，但由於香港法例規定未滿十八歲不能登記成為選民和不能投票，所以與一九九五年的調查一樣，在處理十八歲以下的被訪者時，我們主要探討他們未來的投票意欲。

首先是十八歲或以上被訪者。表七顯示，全港性樣本與沙田區總樣本分別有 33.0% 及 31.4% 的被訪者有議會投票的經驗。據選舉事務處的資料顯示，十八至二十五歲的選民在一九九四／九五年三級議會的平均投票率分別為區議會的 33.3%、兩個市政局的 21.9% 及立法局的 31.1%（雷競璇、沈國祥，1996：102-4）。由於我們的問題涉及被訪者過去在任何選舉中的投票經驗，投票參與率理論上應該較高，因此有理由相信我們一九九六年的調查數字可能有點偏低。一九九五年的調查中，全港性樣本與沙田區總樣本分別錄得 36.7% 及 39.4% 的被訪者有議會投票的經驗，我們認為是較為接近事實的。然而，這少許的差異不足影響調查的可信性，因為一九九六年調查的十八歲被訪者在去年時是沒有投票權的，而作為對比的政府數字則是當時的十八至二十五歲，故此一九九六年被訪者的投票經驗有所減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不一定是實際的減少，而更可能是時間所形成的落差有以致之。

至於十八歲以下的被訪者，不論屬於全港性樣本還是沙田區總樣本，皆有超過八成半的被訪者表示年滿十八歲時會在將來的選舉中投票（參看表八）。簡言之，香港十八歲以下的青少年明顯展現出較強烈的政治參與（特別是投票）意欲，而且這強烈的意欲也沒有在沙田區和全港之間形成任何顯著的差異，這種意欲較一九九五年的調查來

得更為強烈，在全港性樣本和沙田區總樣本中，表示會投票的被訪者分別增加了 7.3% 和 8.4%。然而，正如我們在一九九五年的調查報告中指出，這種投票意欲在將來會否變成具體行動仍然是未知之數，因為實在有太多外來因素影響投票傾向。

表七：十八歲或以上被訪者的議會投票參與（%）

議會投票經驗	全港性樣本		沙田區總樣本	
	1996	1995	1996	1995
沒有 ¹	64.1	63.3	66.1	60.6
有	33.0	36.7	31.4	39.4
忘記	2.9	0.0	2.4	0.0
(總人數)	(799)	(931)	(245)	(180)

註1：包括沒有登記為選民的被訪者。

表八：十八歲以下被訪者的議會投票意欲（%）

議會投票意欲	全港性樣本		沙田區總樣本	
	1996	1995	1996	1995
不會	8.2	14.8	4.9	15.3
會	86.0	78.7	87.4	79.0
未決定／不知道	5.8	6.5	7.6	5.7
(總人數)	(500)	(649)	(182)	(157)

基本法是香港九七回歸中國後的憲法性文件，它對香港特別行政區作出了原則性的規範，作為香港實行高度自

治的根據，同時亦界定了特區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我們討論青少年的公民意識及參與時，亦應該探討他們對基本法的認識。一九九六年的調查因此加入了一條詢問青少年是否看過基本法的問題。然而，我們的調查發現，大多數香港青少年很少關注基本法，全港性樣本及沙田區總樣本均有七成半的被訪者完全沒有看過基本法，看過的只有二成多一點（參看表九）。這個發現與較早前香港律師會委託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進行的一個有關港人認識基本法的調查相若（《信報》，1996年10月30日，頁7）。如何普及香港人尤其是青少年對基本法的關注及認識，將是未來特區政府必須正視的問題。

表九：被訪者看過基本法的頻數

曾否看過基本法	全港性樣本		沙田區總樣本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沒有看過	989	75.9	326	76.3
看過	314	24.1	101	23.7
總計	1,303	100.0	427	100.0

被訪者對九七回歸的態度

與一九九五年的調查一樣，有關九七回歸的態度，我們分別詢問了被訪者三方面的問題，一是對九七年後香港狀況的估計，二是面對九七最擔心的問題，三是有能力時會否考慮移民。通過與一九九五年的調查作比較，我們將可以捕捉到青少年對九七回歸的態度的轉變。

1. 對九七年後香港狀況的評估

表十臚列出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的調查中被訪者對九七年後香港狀況的評估。在一九九五年的調查中，全港性和沙田區總樣本分別有 59.2% 和 56.8% 的被訪者認為九七年後香港的狀況會保持不變，認為會更差的有 22.7% 和 26.7%，認為會更好的有 12.9% 和 12.2%，而認為不知道／很難說的有 5.1% 和 4.3%。一九九六年的調查則顯示，在全港性和沙田區總樣本中，分別有 55.6% 和 56.9% 的被訪者認為九七年後香港的狀況會保持不變，認為會更差的有 21.6% 和 20.6%，認為會更好的有 17.3% 和 15.9%，而認為不知道／很難說的有 5.4% 和 6.6%。就結果而言，一九九六年全港性及沙田區的兩個樣本差異不大，均有過半數的被訪者認為九七年後香港的狀況將會保持不變，但認為會變得更差的人也不少，而且比認為會變得更好的人為多。這說明了整體上香港青少年對九七年後香港的看法還是悲觀多於樂觀的。然而，與一九九五年比較，認為九七後香港的狀況會變得更好的被訪者較一九九五年有所增加，其中全港性樣本增加了 4.4%，而沙田區總樣本增加了 3.7%；另一方面，認為九七後香港的狀況會變得更差的則較去年減少，全港性樣本減少 1.1%，而沙田區總樣本減少了 6.1%。換言之，在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整整一年中，香港青少年對九七年後的悲觀看法，已有緩慢的改善。其中原因，應與九五年底以來，香港的客觀政治和經濟環境均轉趨平穩有關。

表十：被訪者對九七年後香港狀況的估計（%）

對九七年後香港狀況 的估計	全港性樣本		沙田區總樣本	
	1996	1995	1996	1995
更差	21.6	22.7	20.6	26.7
一樣	55.6	59.2	56.9	56.8
更好	17.3	12.9	15.9	12.2
不知道／很難說	5.4	5.1	6.6	4.3
(總人數)	(1,303)	(1,660)	(427)	(325)

2. 面對九七最擔心的問題

究竟香港青少年面對九七回歸最擔心些甚麼呢？與一九九五年比較，這些擔心又有沒有改變呢？表十一顯示，一九九六年被訪者認為沒有自由／人權（全港性與沙田區總樣本分別有 26.9% 和 25.6%，下同）、政局不穩定（10.1%，12.5%）、治安／貪污惡化（8.1%，9.6%）、中方干預／一國兩制不保（6.1%，6.6%）、就業困難（5.1%，3.1%）、經濟不景／衰退（5.2%，4.2%）、沒有民主／政府專制（3.1%，3.8%）是他們最憂慮事項。其中，沒有自由／人權名列前茅，突顯出青少年在這問題上的關注。

對比一九九五年的調查，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一，表示對九七回歸沒有任何憂慮的被訪者人數較九五年有輕微上升，全港性樣本中表示沒有任何憂慮增加了 2.4%，而沙田區總樣本則增加了 1.9%，這與前述對九七香港狀況的樂觀程度有所增加的情況相符。其二，兩年

表十一：被訪者面對九七最擔心的問題（%）

面對九七最擔心的問題	全港性樣本		沙田區總樣本	
	1996	1995	1996	1995
沒有自由／人權	26.9	17.9	25.6	21.0
政局不穩定	10.1	10.2	12.5	8.8
治安／貪污惡化	8.1	11.3	9.6	11.1
一國兩制不保	6.1	2.8	6.6	3.1
經濟不景／衰退	5.2	6.7	4.2	5.1
就業困難	5.1	11.5	3.1	9.9
大陸人湧入／人口過多	3.6	2.6	4.0	4.5
沒有民主／政府專制	3.1	5.0	3.8	4.5
個人問題：前途、升學、移民	2.6	1.8	2.8	2.6
不適應制度改變	0.8	—	0.9	—
民生福利變差	0.5	1.0	0.2	0.6
解放軍	0.4	—	0.5	—
說普通話	0.3	—	0.2	—
學校進行政治灌輸	—	—	0.5	—
其他	0.4	0.5	0.4	2.0
沒有任何擔心	22.2	19.8	22.1	20.2
不知道／很難說	4.7	8.9	3.1	6.5
(總人數)	(1,303)	(1,656)	(427)	(352)

的調查皆發現青少年對九七回歸的最憂慮的事項是害怕失去自由／人權，但一九九六年所佔的比率較一九九五年大為增加，全港性樣本增加了 9%，而沙田區總樣本則增加了 4.6%，可見青少年對九七年後失去自由／人權的憂慮有增無減。其三，一九九六年有關經濟事項的憂慮較一九九

五年減少，全港性樣本中憂慮就業困難的被訪者從一九九五年的 11.5% 降至九六年的 5.1%，減少了 6.4%；而沙田區總樣本則從一九九五年的 9.9% 降至九六年的 3.1%，減少了 6.8%。擔心因九七回歸而引致的經濟不景亦有所下降。這也許與一九九六年的經濟及就業狀況有所改善有關。相反，由於經濟表現好轉，擔憂焦點有轉向政治層面的趨向，例如一九九六年表示擔憂沒有自由／人權、政局不穩、中方干預／一國兩制不保等都較一九九五年有所增加。尤其是對失去自由／人權的強烈憂慮，某程度上解釋了前面調查發現青少年一面倒地認為享有自由人權是他們最重要的特區公民權利。

3. 對移民的考慮

詢問青少年對九七後香港的狀況的估計及對九七回歸最擔心的問題，固然可以窺察他們面對九七的憂慮及態度，但這些擔憂及態度會否轉化成具體行動，則需要進一步探討。如一九九五年一樣，是次調查詢問了被訪者若有能力的話會否考慮移民的問題。從表十二可以看到，全港性樣本與沙田區總樣本的被訪者的答案十分相近，分別有 59.1% 及 58.1% 的被訪者表示即使能力許可也不會移民，3.8% 和 5.2% 表示可能會，另外 35.9% 和 35.6% 則表示會或已經辦妥。若將「可能會」與「會／已辦妥」兩個類別合併一起看，儘管香港青少年移民意向情況較一九九五年有少許下降，但仍相當嚴重，依然有約四成的青少年考慮過或可能會考慮移民，而問題只是他們有否足夠能力而已。

表十二：被訪者對移民的考慮（%）

對移民的考慮	全港性樣本		沙田區總樣本	
	1996	1995	1996	1995
不會	59.1	55.0	58.1	54.8
可能會	3.8	5.4	5.2	6.0
會／已辦妥移民	35.9	37.5	35.6	38.4
不知道／很難說	1.2	2.1	1.2	0.9
(總人數)	(1,303)	(1,658)	(427)	(352)

在一九九五年的調查中，我們亦曾發現，對九七年後香港狀況較樂觀的青少年，越傾向不考慮移民。一九九六年的調查則進一步確認香港青少年對九七年後香港狀況估計與其移民意向之間的密切關係。表十三指出，不論是全港性樣本還是沙田區總樣本，結果都顯示，對九七年後香港狀況信心越大（更好）的被訪者，越傾向不考慮移民，相反亦然。在全港性樣本中，表示如有能力也不會移民的被訪者中，認為香港九七年會變得「更好」的有 72.6%，表示會「更差」的只有 39.1%；相反，表示會移民的被訪者中，認為香港九七年會變得「更好」的只有 25.7%，表示會「更差」的則有 58.0%。兩個樣本的卡方測試（Chi-square test）均顯示，對九七年後香港狀況估計與移民意向都呈統計上的顯著關係（ $p < 0.01$ ）。換言之，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香港青少年考慮是否移民的一個重要前提，是來自他們對九七年後香港的信心的評估。

表十三：被訪者對九七後香港狀況評估與移民考慮的關係（%）

對移民的考慮	全港性樣本			沙田區總樣本		
	更差	不變	更好	更差	不變	更好
不會	39.1	64.7	72.6	31.0	65.3	75.0
可能會	2.8	4.9	1.8	3.4	5.9	2.9
會／已辦妥移民 (人數)	58.0 (281)	30.3 (712)	25.7 (226)	65.5 (87)	28.9 (239)	22.1 (68)
	$(\chi^2=85.256; df=4; p<0.01)$			$(\chi^2=45.595; df=4; p<0.01)$		

究竟青少年的個人背景特徵與九七態度（九七年從香港狀況的評估和若有能力時對移民的考慮）有沒有關係呢？為此，我們進行了相關分析，以查驗它們之間的關係。從表十四可以看到，在全港性樣本中，性別與九七評估存有顯著的正相關，而與移民考慮存有顯著的負相關，即男性被訪者較傾向認為九七年後香港的狀況會更好，而且較傾向不作出移民考慮。這樣的結果不易解釋，但可能與女性較具理想主義色彩有關，因此對未來前景較多疑慮而欲一走了之。出生地只與九七評估呈現顯著的負相關，即在香港出生的被訪者較傾向認為九七年後香港狀況會更差，但是否香港出生與移民考慮沒有任何關連。這或許是香港出生者較認同香港，也因此容易感到香港的變動而引發對前景的憂慮。教育只與移民考慮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即教育程度越高的被訪者越傾向作出移民的考慮。這多少是因為教育程度高者對民主的西方世界有較多的認識與嚮往。就業／在學與九七評估和移民考慮均沒有任何顯著的

關係。沙田區總樣本的結果與全港性樣本稍有分別，只有性別與九七評估和移民考慮呈現顯著的關係，其他的特徵均不顯著。

表十四：被訪者個人背景特徵與九七態度的相關分析（相關係數）

個人背景特徵	全港性樣本		沙田區總樣本	
	九七評估 ¹	移民考慮 ²	九七評估	移民考慮
性別（女=0；男=1）	.1213**	-.0840*	.1627*	-.1250*
年齡（15-24）	.0335	-.0232	-.0083	-.0577
出生地（非香港=0；香港=1）	-.1151**	.0169	-.0536	-.0028
教育（由小學或以下至大學或以上）	-.0279	.0887**	-.0279	.0191
在學／就業（就業=0；在學=1）	.0073	-.0130	.0011	-.0432

* 者表示經兩端檢驗顯著度小於 0.05；

**者表示經兩端檢驗顯著度小於 0.01。

註 1：九七評估的量度為：更差=1；不變=2；更好=3。

註 2：移民考慮的量度為：不會=1；可能會=2；會／已辦妥移民=3。

作為未來特區公民可能面對的困難

香港回歸中國已迫在眉睫，但無可否認，中港兩地生活及文化始終存在著一定的疏離關係。這種疏離關係有其複雜的歷史及政治因素背景。自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始，香港便在殖民地統治下經歷著有異於中國大陸的發展，形

成了獨特的社會形態。不過，在一九四九年前，這種形態並不顯著。相反，自四十年代中期開始，由於國內政局不穩，大陸移民不斷擁入，港英政府收緊移民政策，限制大陸人士進入香港；此外，戰後本土出生的第二代香港人也逐漸成長，加上香港經濟的起飛，使得香港的本位意識慢慢成形（王家英，1996）。不少學者已經注意到這個趨勢（Baker, 1983; Lau and Kuan, 1988; Choi, 1990; Chan, 1994）。香港本位意識除了表現在文化生活特質不同外，更為學者所關注的是，香港充滿自由主義色彩的本位意識及由於回歸中國而衍生出的民族主義之間，會否存在著某種內在的張力（Kuan and Lau, 1989），從而形成香港回歸中國後中港之間的潛在矛盾（王家英，1996）。有鑑於此，在一九九六年的調查中，我們亦對有關問題進行探討，以進一步呈現九七回歸前夕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中香港本土認同和中國國家認同之間的關係的複雜性。

1. 身份認同及香港本位意識

我們的討論先從身份認同開始。表十五顯示，當被訪者被問及其身份時，全港性樣本及沙田區樣本都顯示超過六成的被訪者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多於中國人，其中全港性樣本有 62.5%，沙田區總樣本則有 66.7%，較全港性樣本稍高。另外，全港性樣本及沙田區總樣本分別有 30.0% 和 27.4% 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多於香港人。初步看來，香港青少年認同香港的心態頗為強烈。這與過往的其他調查極為相似（香港亞太研究所、香港青年聯會，1996；Lau, 1992: 152-53）。

表十五：被訪者的身份認同

身份認同	全港性樣本		沙田區總樣本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香港	814	62.5	285	66.7
中國	391	30.0	117	27.4
兩者皆是	86	6.6	20	4.7
兩者皆不是	1	0.1	0	1.2
不知道／好難講	11	0.8	5	0.0
總計	1,303	100.0	427	100.0

然而，只問身份認同不足以照明香港本位意識的複雜性。為此，我們另外向被訪者詢問了一些有關香港本位意識的問題。所謂香港本位意識（有論者又以「大香港意識」名之），是指一種傾向以香港作為中心的心態，並據此論斷其他地方，而它主要的指標，就是對香港的歸屬感和優越感。據表十六的調查結果顯示，香港青少年的香港本位意識極之明顯。全港性樣本及沙田區總樣本分別有 77.3% 和 77.0% 同意／十分同意「香港的制度相當完善，因此中國要發展，應該多些學習香港的制度」；73.5% 和 73.0% 同意／十分同意「香港人自己有足夠能力管理好香港」；73.7% 和 73.3% 同意／十分同意「當中國的利益與香港的利益出現衝突時，應該先考慮香港的利益」。這三項指標的結果在在證明，香港青少年不論對香港的制度、香港人的能力和香港的利益，均十分肯定，由此形成的對香港的普遍認同，不言而喻。

表十六：被訪者的香港本位意識

香港本位意識	全港性樣本		沙田區總樣本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香港一：香港的制度相當完善，因此中國要發展，應該多些學習香港的制度				
十分不同意	3	0.2	1	0.2
不同意	160	12.3	53	12.4
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107	8.2	37	8.7
同意	947	72.8	314	73.7
十分同意	58	4.5	14	3.3
不知道／很難說	26	2.0	7	1.6
總計	1,301	100.0	426	99.9
香港二：香港人自己有足夠能力管理好香港				
十分不同意	4	0.3	0	0.0
不同意	242	18.6	73	17.1
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75	5.8	37	8.7
同意	919	70.7	302	70.7
十分同意	36	2.8	10	2.3
不知道／很難說	24	1.8	5	1.2
總計	1,300	100.0	427	100.0
香港三：當中國的利益與香港的利益出現衝突時，應該先考慮香港的利益				
十分不同意	7	0.5	4	0.9
不同意	193	14.8	60	14.1
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125	9.6	47	11.0
同意	930	71.5	302	70.7
十分同意	28	2.2	11	2.6
不知道／很難說	17	1.3	3	0.7
總計	1,300	99.9	427	100.0

2. 自由人權與國家民族的潛在矛盾

在上文討論公民權利時已發現，無論是現時的香港抑或是未來的香港特區行政區，自由人權是青年人認為最重要的公民權利。正因為如此，害怕失去自由人權亦是青年人面對九七回歸中最為擔憂的地方。香港人的個人主義一向強烈（Lau and Kuan, 1988），由此而衍生的自由人權意識似乎亦已深深根植於香港青少年的重要公民價值觀之內。然而，香港即將回歸中國，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香港人未來的公民意識自然必須面對如何與國家民族整合的問題。以往殖民地教育及文化下的非國家民族化現象勢必改變。如此，強調個人的自由人權，與強調社群的國家民族觀念，在香港的青少年心目中有沒有矛盾呢？

為了直接探討這個可能存在的矛盾，我們向被訪者詢問維護自由人權及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的取捨問題。表十七顯示，全港性樣本與沙田區樣本均有超過六成的被訪者認為維護自由人權較國家民族利益重要（全港性樣本：66.2%；沙田區總樣本：67.0%），認為國家民族利益較重要的都不超過二成（全港性樣本：18.5%；沙田區總樣本：18.3%），另外還有一成多的被訪者認為兩者皆重要（全港性樣本：12.0%；沙田區總樣本：12.2%），不能在二者之間作出取捨。顯而易見，香港青少年對自由人權的重視，是遠較對國家民族的重視來得強烈的。

為了進一步澄清香港本位意識與自由主義的關係，以下我們先將身份認同與自由人權／國家民族兩項指標進行了交互分析，結果列於表十八。為了方便分析，我們將身份認同中只認同香港人及只認同中國人的被訪者，與只認為維護自由人權較重要及只認為國家民族利益較重要的被

訪者，進行對比分析。結果顯示，認同香港人的被訪者中有 85.6% 認為自由人權較重要，認同中國人的只有 63.2%；相反，認同香港人的被訪者中只有 14.4% 認為國家民族較重要，認同中國人卻有 36.8%。這反映出認同香港人較認同中國人的被訪者有較強的自由人權價值觀念；相反，認同中國人較認同香港人的被訪者有較強烈的國家民族觀念。而這種差異在卡方測試下亦出現顯著關係。沙田區總樣本的情況與全港性樣本十分相似。

表十七：維護個人自由人權與國家民族利益的取捨

自由人權與國家民族	全港性樣本		沙田區總樣本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自由人權較重要	863	66.2	286	67.0
國家民族較重要	241	18.5	78	18.3
兩者皆重要	156	12.0	52	12.2
不知道／好難講	43	3.3	11	2.6
總計	1,303	100.0	427	100.1

表十八：身份認同與自由人權／國家民族（%）

自由人權與 國家民族	全港性樣本		沙田區總樣本	
	香港人	中國人	香港人	中國人
自由人權較重要	85.6	63.2	82.7	67.7
國家民族較重要	14.4	36.8	17.3	32.3
(人數)	(715)	(323)	(254)	(99)
	$(\chi^2=66.615; df=1; p<0.01)$		$(\chi^2=9.488; df=1; p<0.01)$	

那麼身份認同、自由人權／國家民族與香港本位意識又有沒有關係呢？我們為此也進行了相關分析。表十九的結果顯示，傾向認同香港的青少年與香港本位意識存在著顯著的相關，但全港性樣本與沙田區總樣本之間的側重面有所不同。在全港性樣本中，身份認同與「中國應學習香港」及「香港利益優先」兩種態度呈現統計上顯著的正關係，表示越傾向認同香港的青少年，越認為香港制度優越，中國應學習香港，及越認為當中港出現利益矛盾時，應先考慮香港利益。沙田區總樣本中，身份認同則與「港人治港能力」及「香港利益優先」兩種態度呈顯著的正關係，與「中國應學習香港」沒有任何顯著相關。至於自由人權／國家民族與香港本位意識的關係，在全港性樣本中，自由人權／國家民族與三項態度均呈現統計上顯著的

表十九：身份認同、自由人權／國家民族與香港本位意識的相關分析（相關係數）

香港本位意識 ¹	全港性樣本		沙田區總樣本	
	身份認同 ²	自由/國家 ³	身份認同	自由/國家
中國應學習香港	0.1262**	0.1447**	0.0613	0.2307**
港人治港能力	0.0460	0.1314**	0.1184*	0.1851**
香港利益優先	0.0782**	0.0621*	0.1056*	0.0674

* 者表示經兩端檢驗顯著度小於 0.05；

**者表示經兩端檢驗顯著度小於 0.01。

註 1：所有態度中的「不知道／很難講」都被視為缺值（missing value），不在計算之內。

註 2：身份認同：香港人 = 1；中國人 = 0，下同。

註 3：自由/國家：自由人權較重要 = 1；國家民族較重要 = 0，下同。

正關係，表示越認為維護自由人權較維護國家民族利益重要的青少年，越認為中國應學習香港制度、港人有能力治港，以及以香港利益為首位。在沙田區總樣本中，「中國應學習香港」及「港人治港能力」兩種態度呈現顯著的正關係，「香港利益優先」則與自由人權／國家民族沒有關係。

3. 與中國整合的問題

還有半年的時間，香港便會回歸中國，成為中國主權下的特別行政區。我們在此時此刻討論公民意識，無可避免涉及如何與中國整合的問題，特別是對中國的認識與認同。

首先，我們要求被訪者對中國認識程度作出自我評價。結果發現，全港性樣本及沙田區總樣本分別顯示只有 7.6% 及 5.9% 的被訪者自稱對中國有較深的認識，回答認識淺的有 66.0% 及 67.9%（參看表二十）。可見一般香港青少年普遍認為自己對中國缺乏認識。

表二十：被訪者對中國認識的自我評價

對中國的認識	全港性樣本		沙田區總樣本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淺	860	66.0	290	67.9
一般	341	26.2	112	26.2
深	99	7.6	25	5.9
不知道／好難講	3	0.2	0	0.0
總計	1,303	100.0	427	100.0

既然香港青少年自認對中國認識不深，這會不會加深他們對中國的疏離意識呢？表二十一顯示，儘管上文發現香港青少年普遍自認對中國認識不深，但他們對中國仍然相當關心和肯定。全港性樣本及沙田區總樣本分別有 81.0% 和 78.6% 同意／十分同意「香港人應該多些參與幫助中國大陸的社會經濟發展」；68.0% 和 59.9% 同意／十分同意「九七後的香港，學校應該加強國家民族教育」；52.6% 和 50.4% 同意／十分同意「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悠長、文化深厚，很值得我們驕傲」。雖然香港的青少年本位意識濃厚，他們對中國的疏離意識並不強，大部份仍然贊同加強中港溝通、加強香港的國家民族教育，並對中國歷史文化作出正面的評價。

我們對身份認同、自由人權／國家民族與中國意識的指標進行了相關分析，以探討它們之間的關係。表二十二所示，全港性樣本中身份認同及自由人權／國家民族只對「中國歷史文化感到驕傲」一項態度呈現顯著的負關係，即越傾向認同香港人及認為自由人權較重要的被訪者較少中國歷史文化驕傲感；相反，越傾向認同中國人及認為國家民族利益較重要的被訪者，對中國歷史文化驕傲感越強。沙田區總樣本方面，身份認同及自由人權／國家民族除了對「中國歷史文化感到驕傲」一項，如全港性樣本般呈顯著的負關係外，亦對「幫助大陸發展」的態度呈現負相關。相較身份認同、自由人權／國家民族與香港本位意識的密切關係，身份認同、自由人權／國家民族與中國意識便來得不密切。

表二十一：被訪者的中國意識

中國意識	全港性樣本		沙田區總樣本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中國一：香港人應該多些參與幫助中國大陸的社會經濟發展				
十分不同意	3	0.2	0	0.0
不同意	111	8.5	40	9.4
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105	8.1	43	10.1
同意	1,020	78.5	323	75.6
十分同意	32	2.5	13	3.0
不知道／很難說	28	2.2	8	1.9
總計	1,299	100.0	427	100.0
中國二：九七後的香港，學校應該加強國家民族教育（例如學普通話、掛國旗、唱國歌等）				
十分不同意	3	0.2	0	0.0
不同意	246	18.9	88	20.6
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109	8.4	69	16.2
同意	842	64.8	249	58.3
十分同意	42	3.2	7	1.6
不知道／很難說	58	4.5	14	3.3
總計	1,300	100.0	427	100.0
中國三：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悠長、文化深厚，很值得我們驕傲				
十分不同意	25	1.9	4	0.9
不同意	388	29.8	155	36.4
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168	12.9	44	10.3
同意	665	51.1	208	48.8
十分同意	20	1.5	7	1.6
不知道／很難說	35	2.7	8	1.9
總計	1,301	99.9	426	99.9

表二十二：身份認同、自由人權／國家民族與中國意識的相關分析（相關係數）

中國意識 ¹	全港性樣本		沙田區總樣本	
	身份認同	自由/國家	身份認同	自由/國家
幫助大陸發展	-0.0332	-0.0254	-0.1038*	-0.1001
學校加強國家民族教育	0.0471	0.0217	-0.0386	-0.0523
對中國歷史文化感到驕傲	-0.1787**	-0.1378**	-0.2378**	-0.1684*

* 者表示經兩端檢驗顯著度小於 0.05；

**者表示經兩端檢驗顯著度小於 0.01。

註 1：所有態度中的「不知道／很難講」都被視為缺值（missing value），不在計算之內。

結論

在一九九五年調查的基礎上，我們對香港青少年當前的公民意識狀況和變化、對九七的態度和回歸中國可能出現的矛盾作了初步的分析。我們的結論包括：

1. 香港青少年的公民意識狀況既有穩定的一面，也有變化的一面。相對而言，在公民權責的認知方面，一九九六年香港青少年尤其肯定個人的自由人權等權利，責任方面則著重個人守法及盡本份的層面。在公民態度方面，香港青少年仍然傾向消極負面及犬儒主義，而較一九九五年尤有過之，這包括對政治人物不信任；認為政治十分複雜，不易明白；對當前的政治現實感到無力；以及對政府的政策感到沒有影響力。這再次證明香港青少年的公民態度，極可能是香港當前

社會政治環境的衍生物。然而，香港青少年對投票是向政府表達意見的最有效方法仍與一九九五年一樣，抱有積極的態度，對九七回歸的態度亦較一九九五年正面。至於香港青少年的公民參與方面，與一九九五年的調查相若，一方面青少年對新聞時事表現出頗高的關注，但在社會參與及政治參與上便顯得有點裹足不前。雖然如此，調查也發現，十八歲以下的青少年還是顯露出強烈的政治參與（主要表現在投票傾向上）意欲，儘管這意欲會否轉化成具體行動還是未知之數。

2. 香港青少年對九七後的香港狀況的評估較一九九五年稍為樂觀，但整體上仍稍顯悲觀，雖然有一半認為會維持不變，但仍然有二成多認為香港在九七年後會變得更差；而且仍然有四成多表示若能力許可的話，他們會／可能會／已經辦妥移民。此外，他們對九七的憂慮多集中於政治與經濟兩方面，特別是擔心九七後民主、自由、人權等的喪失和經濟出現衰退等。
3. 由於九七回歸牽涉到香港公民意識的「民族化」，一九九六年的調查特別加闢了公民意識中有關民族意識的探討。結果發現，香港青少年的香港本土認同十分強烈，同時認為維護自由人權較維護國家民族利益來得重要。認同香港及維護自由人權較重要的青少年的香港本位意識亦較高。儘管如此，香港青少年並沒有因此對中國存有太大的疏離感，相反，他們大多數對中國歷史文化和在香港推動民族教育十分肯定，也願意促進中國大陸發展，這對香港與中國未來的國家民族整合，應是正面的。

4. 總體而言，沙田區的青少年與香港青少年的公民意識狀況、九七態度和民族意識等，儘管在個別指標上有細微的分別，但並沒有任何重大的差異，而由於沙田區總樣本的樣本數較少，這些細微的差異極可能由於抽樣誤差所造成。

參考文獻

- 王家英（1996），《香港人的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一個自由主義的解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王家英、沈國祥（1996），《後過渡期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全港與沙田的比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信報》，1996年10月30日，頁7。
- 香港亞太研究所電話調查研究計劃（1995），《後過渡期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調查報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香港亞太研究所電話調查研究計劃（1996），《香港青年的民族意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香港政府統計處（1996），《一九九六年中期人口統計：簡要報告》。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
- 雷競璇、沈國祥編（1996），《香港選舉資料匯編：1995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劉兆佳（1993），《過渡期香港政治》。香港：廣角鏡。

- Baker, Hugh (1983), "Life in the Cities: The Emergence of Hong Kong Man," *The China Quarterly*, 95: 469-79.
- Chan, Hoi-man (1994),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1994*, edited by Donald H. McMillen and Man Sai-wai.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pp. 443-68.
- Choi, Po-king (1990), "Popular Culture," in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1990*, edited by Richard Y.C. Wong and Joseph Y.S. Che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pp. 537-63.
- Kuan, Hsin-chi and Lau Siu-kai (1989), "The Civic Self in a Changing Polity: The Case of Hong Kong," in *Hong Kong: The Challenge of Transformation*, edited by Kathleen Cheek-Milby and Miron Mushkat.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 91-115.
- Lau Siu-kai (1992), "Political Attitudes," in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0*, edited by Lau Siu-kai, Lee Ming-kwan, Wan Po-san and Wong Siu-lun.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 129-58.
- Lau, Sui-kai and Kuan Hsin-chi (1988), *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Civic Awareness of Hong Kong Young People 1996

Timothy Ka-ying Wong
Kwok-cheung Shum

Abstract

This report presents the findings of the second annual telephone survey on civic awareness of Hong Kong young people in the late transitional period conducted in November 1996. The survey was commissioned by the Shatin District Board. For comparative purpose, we randomly interviewed 1,303 young people aged 15-24 from Hong Kong as a whole and additionally 271 more of the same age cohort from the Shatin District. Our findings include: (1) Hong Kong young people's civic awareness contains the aspects of both stability and change. On civic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1996 Hong Kong young people tended to place more emphasis on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as well as on obeying the law and fulfilling civic obligations. On civic attitudes, they were still rather negative and cynical, and even more so compared with 1995. Nevertheless, they continued to regard voting in an election a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to the government and were more receptive to Hong Kong's 1997 sovereignty transfer. On civic participation, similar to 1995, Hong Kong young people in 1996 displayed a strong concern for daily news and events on the one hand but a weak one for actu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n the other. (2) Over the year, their perception of the post-1997 Hong Kong improved a little bit, but in general it was still somewhat gloomy; there were still over 40 per

cent of the respondents indicating that if conditions permitted they would consider leaving Hong Kong. (3) As the 1997 sovereignty transfer brings in the national dimension, the 1996 survey also explored the national awareness in Hong Kong young people's civic awarenes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Hong Kong young people had a strong indigenous identity and believed that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as well as local interests, were more important than national and state interests. Yet, they were also very proud of the Chinese historical-cultural past, were quite willing to help in Chines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were very willing to strengthen their national education. (4) With only minor variations, in 1996 young people in Hong Kong as a whole and in the Shatin District showed no major differences in their civic awareness, their perception of Hong Kong's 1997 sovereignty transfer and their attitude towards the Chinese nation.